寓于根基主义思想中的“人民性”问题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概念的本质

万　海　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俄国作家、思想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著作丰赡,思想深邃而复杂,而根基主义(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则是贯穿他毕生创作的一根思想主线,因为他的创作与思想既来自于根基,又以根基为参照和皈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中,根基(почва)一词,除了有土壤、大地、乡土的含义,还有两层引申意义:第一层是指人民、老百姓、民间;第二层更高的引申意义是指俄国文化,尤其指普通百姓信仰的东正教文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从外延和内涵来看,根基基本上等同于人民。“第一个根基,第一个最重要的根基,一定要健全,尽可能要健全的根基,毫无疑问,这就是我刚刚谈到的俄国人民,我刚刚谈到的那一片汪洋大海。我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俄国人民,就是平民百姓和农民,既是负担税赋的力量,就是那双长满老茧的双手,就是那片汪洋大海。”[1] 1067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和“人民性”概念的认识,是其根基主义思想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始至终就极其重视“人民性”,他曾指出“关于人民和对人民的看法以及对人民的理解这个问题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与我们的整个未来生死攸关的头等重要问题。”[2] 210虽然他和其他根基派思想家存在一些殊途同归的相似观点,但就其“人民性”概念而言,它既具有个人思想观念成熟过程中的自发性和独创性,也带有思想论敌赋予其的阵营或派别烙印。所以,厘清他对“人民性”及相关概念的认识,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其根基主义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概念是随着他阅历的增长而逐渐充实和确定下来的。他初入文坛就开始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心理,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期又与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回归首都文化圈后经常接触普通读者和各行各业的老百姓,而他的创作中无处不体现出他对“人民性”的认识。因此可以说,他的创作和思想基本上是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性”问题的重视,与其根基主义思想密切相关,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斯拉夫派理论家看到了欧洲1848年革命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害怕革命思想破坏俄国社会的独特性,于是便开始提倡用俄罗斯东正教来“教育社会”、教育人民。然而,这些建议和倡议一直停留在书本和小圈子的清谈中,除了一些斯拉夫派流于形式地试图接近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之外,大部分斯拉夫派缩进了书斋,根本没有到实践中推行理论的勇气,沦为夸夸其谈的思想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与此同时,一种拿俄国的落后性开涮的论调开始流行于欧洲文化界,这其中,法国作家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侯爵(1790—1857)写的《1839年的俄国》一书(19世纪40年代首次发表,发表后多次修订、再版)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上至沙皇尼古拉一世,下至俄国人民,都成了他讥讽的对象。这种对俄国用心叵测的调侃和指责,在俄国人看来,具有强烈的仇俄论色彩。在欧洲思想界逐渐蔓延的仇俄心理,也逐渐反渗回俄国的思想界特别是西方派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呼吁知识分子热爱人民、回归根基,主张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兼容并蓄的根基派思想就适时而生了。

一般认为,《〈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是根基主义者的第一份共同的思想纲领。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所办的《时代》杂志被查禁后,又更名为《时世》复刊。但《时世》仍然是一个短命的杂志,它只存在了一年多,勉为其难、拖拖拉拉地出到第13期,就不得不宣告停刊。在为了这两份杂志的征订和存活而撰写的《〈时代〉杂志1862年征订启事》《〈时代〉杂志1863年征订启事》《关

收稿日期:2016-04-19

作者简介:万海松(1976—),男,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

于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之后〈时世〉月刊出版事宜的声明》《关于由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出版的文学和政治月刊〈时世〉的出版事宜》里，根基主义思想又多次得到了重复和深化，并竭力张扬了自己独树一派的观点和立场。因此，这些文本加起来算是根基主义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共同的思想纲领。至于发表在这两个杂志上的那些根基主义观点鲜明的文章，则可以认为是根基派在《时代》和《时世》这两份杂志存在时期的共同思想的体现。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基主义者一词虽然来自于杂志同仁对"人民性"的认识，却不是这两个杂志的同仁的自称，而是作为激进的西方派阵营的《现代人》杂志对《时代》和《时世》的讥嘲。1861 年，文学评论家马克西姆·安东诺维奇(1835—1918)在《现代人》杂志第 12 期上发表了《论根基：并非农业学意义上的，而是符合〈时代〉精神的》一文。安东诺维奇指出，《时代》杂志所提出的"回到根基"的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无非是被斯拉夫派奉为圭臬的"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概念的变体。从提出"人民性"到现在，斯拉夫派根本没有解决"人民性"的问题，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一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在他看来，"人民性"本身就是一个空洞之词，围绕"人民性"的争论只能归结为这样一些问题："没有同情的态度能否理解俄国文学？普希金是不是人民诗人？克瓦斯是不是比水更好的饮料？"[3]356而现在，作为斯拉夫派志同道合者的《时代》杂志提出"根基"的概念，不过是替换"人民性"概念，可想而知，这一新概念同样将落入"人民性"空洞无物的窠臼。他指出，那些认为俄国"根基"在思想特色方面迥异于西欧的人，已经陷入了深刻的迷误之中。安东诺维奇反对那些"并非农业学意义上的，而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所谓"充当和事佬的根基主义者们"(почвенники-примирители)过于拔高俄国和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性，指责他们为"接近人民"所采取的普及教育的举措打着民族统一的旗号，其实不过是浪漫主义的幻想而已。鉴于此，安东诺维奇呼吁："那些为给人民扫盲和接近根基而操心的人，同时也应该操心一下如何提高人民的外部生活条件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福利。"[3]374作为西方派阵营中的一员，安东诺维奇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批评根基主义思想，正确地指出了根基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承继关系，批判了根基主义雄心勃勃的救世主意识。这篇文章虽然在某些方面似乎有断章取义之嫌，但总的来说，其苛刻的讥讽中不乏深刻的洞察。

要认识根基派所理解的"根基"，的确不能绕过斯拉夫派所创造的"人民性"概念。正如安东诺维奇指出的那样，根基派所指的根基，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斯拉夫派"人民性"概念中的人民，也就是除了统治阶级和贵族以外的全体人民，特别是那些将东正教文化完好无缺地保存至今的农民。他们眼中的人民就是那些保存了"人民性"的人们。西方派和民主派也谈"人民性"概念，不过他们是从揭露俄国落后面的角度来认识"人民性"的，在他们看来，"人民性"的价值就在于其暴露俄国自身缺陷的胆魄，在于引起人民急欲革除落后性并使俄国获得新生的激情与力量，由此，他们高度赞扬那些具有"人民性"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从描写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小人物的命运开始萌芽，其"人民性"概念本身就包含在他的根基主义思想中。小人物的穷困出身和悲惨遭遇在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之后，往往还能引发读者"谁之罪？"和"怎么办？"之类的追问，这本身就兼具文学史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价值。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思想的整体语境看，他对"人民性"的认识逐渐走向丰富、立体和深刻，其"人民性"概念主要集中于以下几处核心或焦点。

第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的普通百姓或者说作为根基的人民，其主体基本是居住在城市的商人和市民、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在 1878 年写给几名大学生的一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大学生们存在蔑视人民的心理，他说，商人也是人民"先生们，现在你们自己与知识界的所有报刊异口同声地把莫斯科居民称作'卖肉的'。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卖肉的算不了人民？这就是人民，名副其实的人民，米宁就是卖肉的。"[4]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根基主要是精英阶层(贵族和知识分子)以外的城市各阶层，是传承俄国传统和风习甚至陋习的普通人。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他是描写来自城市知识分子阶层，或者来自小官吏和小市民阶层的人民的作家。在人民的生活里，主要是彼得堡市民的生活里，在脱离了人民之根基的公民的灵魂里，他揭示了独特的发展变化，发现了人性的本质的边缘。……引起他兴趣的是具有强烈的根基主义情结的人们，是大地的人们，过日常生活的人们，忠实于具有根基特色的、日常生活传统的人们。"[5]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也接触过很多来自农村的农民，也把他们看作根基的一部分，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大多数著述中，他们并不是主体，作为其议论和文学描绘对象的大多是城市的底层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主张要区别对待人民身上永恒的美和偶然的丑，并始终对人民怀有好感和敬意。从他早期的作品来看，他笔下的来自根基的小人物大多比较完美，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窘困的经济状况，并未使他们高尚的心灵和美好的品质有任何变质或褪色，他们那熠熠闪光的品德，让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周围环境，乃至整个社会顿时黯然失色。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多次试图在小说中塑造来自根基的、具有榜样力量的典型人物，如《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在这些尽善尽美的形象身上，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争论和周围现实之认识的加深，他不再过于美化这些来自根基的小人物，而是尽可能立体地描绘他们，在指出他们永不泯灭的美德的同时，也用各种细节来形象而生动地表现他们的缺点，如殴妻、虐童、虐待动物、纵饮无度等。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认为，一部分根基的缺点和堕落，并不代表整个根基或者大部分根基已经变质，因为根基的整体一直是完好的，人民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东正教文化的精神基础，他曾在《作家日记》的《论对人民的爱·必须团结人民》一文中指出："不要根据俄国人民经常干的那些坏事判断俄国人民，而是按照他在干自己的最坏事情的时候还经常企盼的那些伟大的、神圣的事物来认识他。"[2]207所以，他始终坚信人民在整体上不会堕落、不会变质。

第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心怀忧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无论其出身平民还是贵族，都属知识分子的主体。在他看来，在很多情况下，贵族基本上可与知识分子画等号，他有时还将知识分子与以沙皇为核心的统治阶级相提并论。知识分子有能力担当人民领路人的角色，不过他们较易受异己思想的淫惑而暂时迷失方向。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与人民一体的，由于一时偏信，他们也许会暂时脱离人民，不过，暂时的脱离反而有助于他们之后的回归，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往往要在少年阶段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获得终生受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主体的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承认或者说不愿意承认他们是一个单独的阶层，或者不妨说，他认为整个俄国都是一个阶层。有评论者认为："对他来说，俄国不存在作为阶级的农民或资产者。他没有注意到俄国的阶级斗争。"[3]从某种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是将理想当成了现实，其中折射出阶级调和论的影子，但这也正符合他在小说和政论中反映出来的一贯追求或期许：知识分子既能与人民融为一体，又能胜任领路人的角色。

第三，关于彼得大帝的改革对俄国人民和俄国文化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拉夫派的看法迥然相异，但异中有同。斯拉夫派大体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破坏了俄国传统文化，致使俄国古风不存，所以对彼得大帝及其改革恨之入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只是触及了俄国的贵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而没有到达人民的最底层，只是使得贵族脱离了人民，而丝毫没有破坏俄国的传统文化。因为要改造人民是很困难的，需要好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彼得的毛病就在于急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结果是歪打正着：人民只是看到改革败坏了风气，改革并没有给人民生活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总体上说，人民与彼得改革前毫无二致。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个说法，俄国的传统文化根本不需要斯拉夫派刻意去恢复，因为它一直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这种观点，与斯拉夫派不承认蒙古征服俄国后给俄国带来任何影响的看法如出一辙。

有鉴于此，在"人民性"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贯反对"环境决定论"。他不同意把人的堕落和犯罪归因于环境，认为人的精神、修养和气质因素要远远大于物质和环境因素。在作家看来，"环境决定论"倾向于将一切对个人不利的因素归罪到社会和环境的头上，认为别人或者环境才是这些罪恶的元凶，一旦个人犯了罪却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和道义责任，这样一来，不但会使罪行得不到惩处，反而更容易让罪犯愈加堕落，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作家担心的不仅是社会环境的恶化，他更忧虑纵容"环境决定论"泛滥将直接导致人的内心普遍变得空虚，人们不再相信最高的上帝，失去了上帝，也就失去了上帝的威慑作用，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就将趋于崩溃的边缘。他虽然认可基督教教义"充分承认环境的压力，怜悯犯罪者"，但同时又断然拒绝模糊"环境问题与义务问题之界限"的"环境哲学"[2]18-33，从而大声疾呼要团结人民，号召大家谋求共同的精神追求。就这一点而言，作家与斯拉夫派思想家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1817—1860）在《论现代人》一文中提出的"团契是人民团结之理想形式"的观点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倡导的根基观

或者说人民观归根结底反映了他以东正教文化为唯一核心和最终落脚点的理念，即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选出来的优秀民族，是“载神”的民族想法。他心目中的根基至少包含两层引申义：一是作为阶层客观存在的普通百姓；二是作为抽象精神实体的俄国传统与风习，主要是以信仰和仁爱精神为主的东正教文化。在我们看来，作家更为看重的其实是作为载体的人民所负载或传承的东正教品性。正如俄国陀学家列昂尼德·格罗斯曼所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宗教是通向人民的唯一道路“他似乎觉得，处于农奴地位的农民的宗教观念以及他们所信奉的东正教，正在为他这位昨天的傅立叶主义者打开一条通向人民根基的唯一道路，亦即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处世哲学——莫斯科的古代遗风，古老的传说，‘根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世代相传的‘俄罗斯式的笃信宗教的’信仰。”[7] 陀思妥耶夫斯基尤为赞叹的人民的典型大体有三类：一类几乎都是俄国正教史上的著名圣徒，如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费奥多西·别切尔斯基、吉洪·扎顿斯基等，他甚至在《群魔》专辟的《在吉洪处》一章里，也着力描写圣徒那无与伦比的道德拯救的力量，若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列于上述圣徒榜，也可谓当之无愧；另一类是过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安分守己的平凡人形象，如农夫马雷和百岁老大娘，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俄国土壤，作为坚定不移的根基，他们拥有信仰的本能，其一言一行本身就散发着俄国东正教文化的魅力，成为他人可以随时修正自己的鉴镜和榜样以及获得慰藉与力量的安全港湾和温馨家园，因为“即便普通百姓中的劣等人，一般都还保存着知识分子丧失了的东西：对上帝的信仰和负罪感”[8]；第三类几乎全是作恶多端后又皈依东正教的回头浪子形象，最典型的就是《作家日记》里《弗拉斯》一篇中所描述的、类似涅克拉索夫诗作《弗拉斯》同名主人公的那些浪子回头的忏悔者。这表明在现代化浪潮开始后的俄国，在普通人身上，其信仰往往都是经历怀疑和堕落、自我拯救和获得他人拯救后才得以最终确立的。在这个意义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在多部长篇小说中热衷描写那些蔑视人民、脱离根基、否定传统的漂泊者形象，也是为了加强他们最终必须回归东正教才得以精神解脱的渴望，拉长审美的距离。就对传统村社文化和东正教宗教力量的重视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观比较接近斯拉夫派。例如，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1804—1860）曾经说过“支撑国家大厦的另一个基础是共同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如果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和它那种令人振奋的力量，俄国大地就不可能重获生机。”[9] 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如此重视“人民性”问题，其深刻动因盖源于此。

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概念，跟他的根基主义思想一样，依然是介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但本质上更接近于斯拉夫派的立场，彰显出作家对俄国人民和俄国文化的信心和期望。然而，在俄国现代化大潮的裹挟下，作家表现出急切的焦虑，因此在关于俄国人民和俄国文化的论断中，不免夹杂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调子，有些断言不无偏颇，甚至罔顾事实、自相矛盾。正如西方派的代表人物赫尔岑对斯拉夫派可谓切中肯綮的批评“斯拉夫主义者最大的迷失就在于他们对问题的回答只是在于问题本身，他们混淆了可能和实际。他们预见到，斯拉夫主义者的道路正通向伟大的真理，应该改变我们对当今种种事件的观点。然而，他们本应继续前进、继续思考，却局限在这种对未来的预见上而停滞不前。因此，他们在曲解事实的同时也歪曲了自身的理解。”[10]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民性”的认识也存在这种有意无意的曲解和歪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矫枉，但有时不免言过其实。

首先，较为刺目的是其过于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崇尚和信仰俄国人民和俄国文化的同时，夸大了它们的能动性和有效性，将对其未来的展望一厢情愿地理想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对人民的爱·必须团结人民》一文中不仅赞同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的所说的“俄国人民早已开化，早已‘有教养’”的说法，同时又承认人民在处于被腐蚀、被诱惑的境地中沾染了陋习，但旋即又强调“不要根据我们的人民现在是什么样子来评判他，而要根据他希望成为什么样子来评判他”[2]207。在别处的论述中，作家也多次将他对人民的期待当成已经可以信赖和依据的铁定事实。

其次，关于向人民学习和如何学习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时常带有反精英主义和反智主义的论调，这几乎使他沦为其身后才出现的民粹主义的先声，因此也极其容易让其“人民性”概念滑入狭隘平民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盲目排外情绪、非理性选择的深渊。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概括了俄国思想界一个争论不休、被反对派讥讽为“克瓦斯与水”的问题“谁更好些——是我们还是人民？人民应该跟随我们走还

是我们跟随人民走?”他给出的答案似乎是折中态度:一方面,知识分子应该“像离家二百年后又回归的浪子”,应该低下头来,“应该崇拜人民,像人民期待一切,既包括思想,也包括形象;崇拜人民的真理,以人民的真理为真理”;另一方面,“人民也要采纳我们带来的很多东西”[2] 211。表面看是双方要互相学习,但此处的重点仍然落在前者,他认为知识分子还是要低下高贵的头颅,向人民谦虚学习。“与人民的接触,使他们获得了非凡的力量。与一切被扭曲的、虚假的、外来的和奴颜婢膝地模仿的东西相反,他们从人民那里洗去了真诚、纯洁、温顺、豁达的智慧和善良。”[2] 209-210 相比而言,两百年前的彼得大帝改革的影响没有触及人民、改变根基,却将知识分子变成了“浪子”。

再次,跟斯拉夫派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断言欧洲无法也不愿去理解俄国和俄国人民,而俄国人民却天生能够理解外国的文化。这种极端的自信又源自欧洲所不懂和不愿去弄懂的俄国文化。“在我看来,我们所拥有巨大才华的作家,可能,注定长期不能为欧洲所了解;甚至是才华越大,越是独特,就越难被认知。与此同时我们则能通过俄罗斯语言了解狄更斯,我深信,我们对他的理解,可能几乎同英国人一样,连他的细致微妙之处都能理解;甚至还可能,我们对他的热爱不亚于他的同胞。”[2] 89 这种完全属于臆造和夸大的自信,反过来又被用来证明俄国人民是天才,俄国文化具有普世性。鉴于这种文化焦虑感,他把描写普通人和小人物较多的诗人普希金奉为俄国社会的先知和启示者,作为俄国人的典型乃至榜样,其原因不外乎是普希金乃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真正懂得人民、信任人民的文学家。“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处处都洋溢着对俄国人的信心,对他那强大精神力量的信心,既然是有信心,那就有希望,对俄国人的伟大希望。……在普希金的身上确实有某种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东西,这种东西在他身上几乎达到真挚动人的地步。”[1] 994-995 在《普希金》演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将普希金标榜为只有在俄国土壤上才能诞生的“全人类理想”的创始者,而俄语的“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的双义性(它兼具“民族性”和“人民性”两个意义),恰好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诠释与定位——普希金既是俄罗斯民族的诗人,又是全世界人民的诗人,可以普适于全世界。应该说,对人民、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借鉴,呼吁知识分子关注现实、回归根基的迫切之心,对弘扬祖国文化的热切渴望,都是根基主义积极的历史意义,也是它具有强劲生命力的原因。但需要警惕的是,如果过分、片面夸大其中的“全人类性(всечеловек)”观点,容易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性”概念乃至根基主义思想从防御的立场演变为进攻的姿态,容易将俄罗斯思想的弥赛亚精神物化为一种进攻性的口号,还容易从文化本位主义滑入文化封闭论,最终有沦为唱大国沙文主义之同调的危险。

参考文献: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0卷[M].张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2]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19卷[M].张羽,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3] АНТОНОВИЧ М. А. О почве (не в агр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мысле, а в духе Времени).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Философия, Критика, Полемика [M]. Ленинград: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8.

[4]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31, к. 1 [M].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8: 23.

[5] БЕРДЯЕВ Н. А. Откровение о человеке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Смысл творчества: Опыт оправдания человека [M]. Харьков: Фолио; Москва: АСТ, 2002: 359-360.

[6] АНДЖЕЙ.В кругу Федора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 [M]. Пер. с польск. М. В. Лескиненым, Н. М. Филатовой.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4: 73.

[7] 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M].王健夫,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231.

[8] 索洛维约夫 弗.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演讲[C]//精神领袖:俄罗斯思想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徐振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3.

[9] 霍米亚科夫.论旧与新[C]//俄国思想的华章.肖德强,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10] 赫尔岑.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C]//俄国思想的华章[M].肖德强,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1.

[责任编辑:修 磊]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Rural Land Transfer Institution on the Farmer's Cultivate Lands Protection Behavior

——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REN Li[1], LONG Yun[2]

(1. *Xiamen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361005;

2.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ngyang Hunan* 421001)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stitution, the integ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land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rural land transfer market system play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armer'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ve behaviors. Because of the defect of the rural land price mechanism in the sample area, the more nonrestriction of the rural land transfer property, the less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ve behaviors will be performed by the farmer. Based on those analysis, for one thing, the times of rural adjustment should be reduc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stabilize rural land structure; for another, the farmer should be entitled to mortgage their rural land contractual rights, and then the rural land's regist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mission should be done completely, for that 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 transfer institution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farmer's property safety perception will be increased, then they can be encouraged to protect the cultivated land actively.

Key words: Rural Land Transfer Institution; Farmer; Cultivate Land Protecting Behavior; Own Land; Transfer Land

Affinity to the People and Russian Progressive Literary Thoughts

WU Xiao-du, XU Le, HOU Dan, WAN Hai-so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Affinity to the people is a key concept of Marxism literary thoughts. As Marx and Engels paid attention to popular literature and encouraged working class poetry, and Lenin clearly stressed "art belongs to the peopl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idea of "affinity to the people" has been the core of socialist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ism. Russian progressive writers and critics greatly developed this idea and thus became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To learn this idea of Marxism literary thoughts and its tradition enforced by progressive literature, and to encourage the artists and critics to serve the people and socialism,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art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Marxism; Affinity to the People; Russian Literature; Lenin; Lev · Tolstoy; Gogol